



## 《我的后半生》中的老年群像

□张莹

《我的后半生》以高收视迎来大结局。收视率高，却评分低，这部以“黄昏恋”为主线的电视剧，出现两极分化的口碑。

很少有一部热播电视剧如此口碑两极分化。爱的爱死：这部剧轻松有趣，好看；不爱的使劲吐槽：这部剧就是老教授“选妃”记，没有正能量。

聚焦老年群体，《我的后半生》在题材上一枝独秀。张国立、杨童舒、严晓频、丁嘉丽、邬君梅、张丰毅、梅婷等一众实力派中老年演员的加盟，又让这部剧看起来流畅自然。

张国立饰演的沈卓然是文学系退休教授，古稀之年失去老伴，这样一个单身老头，竟然上演了令人始料未及的桥段：意外入院，认识了护士长连亦怜，她温柔贤惠，把老教授照顾得无微不至，就在沈教授以为可以共度余生时，护士长要求结婚的前提是要把房子给她的儿子，于是不欢而散；沈教授遇到的第二位是科学家聂娟娟，两个人对戏曲和诗词的探讨相见恨晚，两个人浪漫地登山赏月吟诗，这段感情戛然而止于聂娟娟的病重；第三段感情是被热情勤快的大妈吕原疯狂倒追，她体力充沛，像一个能打硬仗的指挥者，只要她在，一家老小的事情都不用操心，最后两个人因一文一武的巨大差异而分开；第四段是沈教授在

演出时邂逅的化妆师乐水珊，她和沈教授亡妻的相似度95%，这不禁让沈教授怦然心动，他的子女们对这个阿姨也格外喜欢。这时候乐水珊还有个追求者——退役运动员前男友李黑豹，和沈教授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相比，李黑豹健壮，能一把扛起爬山受伤的沈教授。70岁的“霸道总裁”李黑豹在乐水珊和沈教授的婚礼上抢亲，两人终成眷属。沈教授婚礼被破坏后，选择入住养老院。

我想，之所以观众即使不满也要追剧，很重要的原因是“黄昏恋”“夕阳红”这个话题越来越被关注。

记得前些年很火的一档老年相亲节目，也遇到了这种情况：观众一边追这个节目，一边吐槽节目中的嘉宾。老年人相亲，和年轻人不一样，他们追求的不再是“有情饮水饱”，而是更注重生活品质和陪伴，所以节目中的嘉宾，会在第一面就询问收入和住房，问能为自己花多少钱。在相亲市场，如果说年轻人还遮遮掩掩地“看条件”，老年人则都直入主题。他们的这种坦率极其吸睛，导致这个节目一时火遍大江南北。

《我的后半生》给观众刻画了一组老年人生活群像。剧中的“奇葩老人”老苟是最让人羡慕和欢乐的，他带着小20岁的小甜甜，唱歌跳舞吹萨克斯，活在当下，快乐地享受当下，他催促老沈去追爱，他是整部剧欢乐气

氛不可或缺的人物；文学院院长老丁是退休干部的代表，他放下身架，和其他老年人一起参加合唱团，但不幸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越来越严重，甚至有暴力倾向，最后被送进了一个月收费七八千的养老院；还有沈教授的亲家公，爱钓鱼，被老婆管得死死的，看似不自由，却充满关心，可以说，他是这些老年人中最健康的，就是得益于正常的生活和老伴的精心照顾……

电视剧中这些老人似乎就生活在我们周围。像老苟这样快乐养老的越来越多。我经常在千佛山公园里看到几位古稀老人，在寒冬腊月光着膀子抡着很重的石锤飞舞，旁观的年轻人都连连叫好；在山的另一边，一位红衣老人，在盛开的春花下翩翩起舞。说实话算不上舞姿优美，但他舞得很认真很惬意……他们到了这个年纪，完全不用在意世人的眼光。这让我想起不久前余华和董宇辉对话中所说的“人生终将走向陶渊明、欧阳修”。

《我的后半生》结尾，沈教授被李黑豹横刀夺爱，悟出“人生得意须尽欢”。什么是尽欢？也许你以为的退休后的后半生是穿着美美的衣服旅游拍照，但后来发现每天躺在沙发上嗑着瓜子追剧更愉悦，觉得买菜做饭含饴弄孙也是幸福。不哼哼唧唧，取一个最舒服的姿势过好后半生。

## 主题先行下的人物塑造困境

□胡婷

张艺兴主演的温暖现实主义电影《不说话的爱》上映，这部电影试图通过讲述单亲父亲小马和女儿木木之间的感人故事，表现浓厚的父女之情，影片中加入聋人群体议题，交织社会犯罪元素，探讨存在沟通障碍的人们如何和社会相处，呼吁更多人关注听障群体。

影片在主题层面树立了鲜明的正向标杆，对于浓厚父女情的刻画、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乃至镜头对准的聋人群体本身，都能够看出导演希望电影能够给观众带来温暖的、积极向上的情感力量。然而，在这样正向的主题表达之下，电影的人物塑造却呈现出角色动机失真、情感逻辑断裂的倾向，这削弱了主题深度、架空了叙事逻辑，难以真切地打动观众。

从整体上看，聋人父亲小马的所有行为动机都可以归结为对女儿的爱。为了女儿，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他离开早已熟悉的聋人社交圈，笨拙地在酒店当服务员，他被犯罪团伙指使撞车骗取保险，在法庭上将所有罪名包揽在自己身上……一切一切都是为了女儿的快乐、平安，既不至于跟母亲去到陌生的国外，也不至于受到犯罪分子的威胁。

从情感上看，小马对女儿的爱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女儿木木拥有正常的听觉，从生活上的陪伴到工作上的帮助，木木的手语和随之而来的笑容，成为小马寂静无声的世界里唯一响彻的声音，因此，二人之间的父女情异于常人的深厚、深刻。但电影为了突

出这一点，把人物动机几乎完全建立在父女情上面，把片名中的“爱”刻画得过于饱和，以至于减损了人物的丰满度，削弱了主题的厚度，也让聋人议题、社会议题有了煽情化的色彩。电影里，小马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和女儿相处时，他是温柔细腻的好爸爸，但面对想要争夺木木抚养权的前妻，却变得刚强和暴怒，在撞车时，他更露出一种狰狞的凶狠，这种极端转变缺乏足够的心理铺垫，暴露出创作者对角色复杂性处理的粗糙。

再看小马，他对前妻的愤怒和恨意被简单归结为“前妻要夺走女儿”。尽管影片交代了一个事实，即二人离婚时已经约定好，木木到了上学的年龄就将她交由前妻抚养，但怒目圆睁的小马听不进任何劝说和道理，只是一味地想要留住木木。这种情绪变化没有足够的合理性，更像一种服务于“父女情”主题的工具性设定。对于犯罪动机，在犯罪团伙助理阿梅的欺骗下，小马以为想要赚快钱打赢官司，只有通过撞车骗保。说到底，他的犯罪也是为了木木。虽说在犯罪桥段中，电影关联了聋人群体受到的就业歧视问题和易被犯罪者引诱的结构性问题，但当小马从憨厚父亲瞬间切换为冷血罪犯时，既没有道德良知的挣扎，也没有对犯罪后果的恐惧，人为的车祸现场就沦为推动剧情高潮的燃料。

在“父女情”主题统领的叙事中，阿梅的转变也是因为被小马对木木深沉的爱所打动。她虽然参与了骗保计划，诱导小马犯罪，但在法庭上，阿梅目睹了木木的

痛哭和小马的无助后，说出了真相，让正义在正确的时间到来。但阿梅从引诱犯罪到良心发现的转折被处理得非常生硬，她的善念觉醒的情感触发点也在于体现伟大的父爱和公平正义的主题。如此看来，反派人物形象塑造竟仍然诉诸正向主题立意，这种偷懒的设置，让情感的力量变得不堪重负，进一步削弱了人物动机的复杂性和叙事逻辑的自治性。从对阿梅的塑造上来看，前面的“恶”是为了制造犯罪情节，“善”则是为了强行圆满结局，前后的转变中，人们看到的不是饱满的人物弧光，而是作为工具的人物形象。法庭上，小马愿意为保护女儿而包揽罪名时，法官将要据此判决，但当对小马产生悲悯的阿梅说出真相后，法官又转变了判罚。庭审中严格的法律程序可以被嫌疑人的席话所轻易改写，这无疑也削弱了法律与道德议题的严肃性，难以真正体现法律的公正严谨。

最后，跳脱出父女情和公平正义的主题之外，电影还有最后一层重要主题，就是呈现聋人群体的美好形象，但其实，影片对于聋人群体的刻画陷入了浪漫主义的陷阱。小马周围的聋人配角们始终保持着“天真乐观”的单一面貌，无论是街头卖艺者、邻居还是路人，他们总在微笑、拥抱、互相支持，仿佛聋人身份不会带来任何生存压力或精神创伤。但这种乌托邦化的呈现其实消解了聋人群体的真实苦难。在其他影视作品，聋人群体并非像这部电影展现的那样善良、温暖、热情，像是蒋奇明在《漫长



的季节》里饰演的傅卫军，他的狠劲儿才是他身上最好的武装；再如《惠子，凝视》的女主，周围人都叫她“笑一下”，她却露出茫然的神色。微笑，并不是像电影里所说的那样，是听障群体面对其他人的共性。现实恰恰相反，因为与外界沟通困难，更多聋人挂在脸上的是恐慌和不安。而小马的所有笑容，更多的是对待女儿和朋友的憨笑，却没有表现更加深层的情感。

当电影里一句“看到他的时候他一定在笑”成为聋人的注解，虚假的温暖恰恰暴露了创作者的俯视姿态，这将聋人群体简化为

需要被同情的“他者”，并没有把他们当成拥有多元情感和主体性的完整人。

电影的创作困境源于对“主题先行”的过度执着。小马的暴怒、前妻的专断、阿梅的倒戈，聋人群体的乐观，均服务于“爱超越一切”的宏大命题，却牺牲了角色的真实性与社会性。若能将人物动机嵌入更具体的社会语境，并允许角色展现愤怒、恐惧、自私等负面情绪和负面形象，影片或许可突破煽情套路，真正触及聋人群体的生存本质。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2024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